

《人民日报》  
1986.1.20 第1版  
摘转此文

# 哲 学 生 命 的 基 础

高 清 海

“生命在于运动”。这是讲人要增寿，必须经常锻炼。这句话虽是对人的生命说的，却也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按照辩证法观点，世上没有不死之物，只有那些能够在死亡中不断新生的东西才是不朽的。这就是新陈代谢过程本身。由此引伸，可以得出：只有那种勇于变革自身不断创新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生命就在于创新”。

哲学也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真理性——这当然是基本前提——而且在于它由此而对实践所具有的价值。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著名命题。哲学反映时代，它是时代精神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转过来，哲学又服务于时代，正是那些看来十分抽象的原理和范畴，规定着一个时代人们用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价值，也就是哲学生命的基点。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主要就看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表达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论、彻底的辩证法，是业已获得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在历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自觉地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因而成为一切哲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回答当今时代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应当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科学的进步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尤其是在今天改革的时代，适应改革的形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大家的愿望和要求。

但是，理论通向实践的途径却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道路。倡导哲学要研究现实问题并非自今日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创新、要发展也已议论许多年了。回顾这些年来来的状况，不能不承认，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去研究造成这种状况

的幸福，其中包括如何才是“真正关心人”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剧烈竞争突出了效率问题，社会主义决不忽略这一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这也是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赶超现代发达国家必须解决的任务。要很好地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们还要特别着重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提炼理论思维，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应该从现代科学的发展，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经验中加以科学概括，提炼出符合现时代特点的思维方法，因此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已经成了现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课题。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哲学与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迅速发展。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着重说明:除主客观方面的条件以外,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和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有很大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决不是象我们在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简单和明了,即:理论来源于实践、转过来又能指导实践。这是我们经过抽象以后所达到的关于它们之间本质关系的认识。在现实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表现在无数矛盾关系之中,也只有通过不断克服各种矛盾才能使它们统一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这些矛盾犹如无数岔路,只要处理不当,稍一偏离,就有可能越出前进的轨道。所以,人们出于维护哲学生命之心的那一切观念和举动,并不一定都能起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作用,有些甚至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而在我国这些往往正是影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因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

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地适用于无论什么领域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在我看来,如果把这种普遍适用性理解为,无论实践和科学在它们的发展中提出何种问题、何种认识,都早已蕴含在这些普遍原理之中、都可以从它里面演绎出现成的答案,这种理解就不会起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作用。相反地,按照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大千世界已尽收其中,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最多只能为它提供几个新鲜的例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很难用实践和科学提供的新的原理、新的范畴、新的认识补充和丰富自己的内容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尔后又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所发展的科学的哲学理论,他们所写的哲学著作理所当然地成了后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经典文献和基本依据。如果我们由此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限于经典著作范围内的内容,以经典著作是否谈论过某一问题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线的依据,认为凡属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未曾涉及的”范畴、思想,就不能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这也会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这种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马、恩、列个人的思想理论,它是早已完成了的自我封闭的体系,后人能够做的只是挖掘性的工作,当然就谈不到什么新的发展了。

再如,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桩严肃的科学事业,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不当把任何与传统认识有所不同的认识,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发展。但是,如果把这种严肃性和神圣性理解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业只与少数人有关系、同广大理论工作者无关,只同根本观点的变革有关、同理论内容的变化无关,这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发展有大发展与小发展,发展的事业既需要总结实践斗争的经验,也需要概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同时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等。没有广泛的研究工作做为基础,没有细小的量变作准备,也不会有大的飞跃式的发展。

要发展就要有所创新,有所否定,有所变革,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把创新理解为必需抛弃原有原理、原有范畴,代之以完全新的原理、新的范畴,因而可以普遍地去怀疑原有理论的真理性的,随意指责某某观点为老生常谈,这种认识和态度也不会给马

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真正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掌握的那些哲学真理,并不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提出和重新创造的,它是人类在数千年中历经艰辛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和思想精华的结晶。没有前人的思想成果,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和思想前提。轻易地抛弃这些原理,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再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源泉,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如果从“实践出真知”得出实践家就是理论家、哲学家,以无论何种形式否认或者降低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作用,也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区别的一面,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关系。否认二者的统一,会影响它们的发展;否认二者差别,把它们混同起来,同样会影响它们的发展。“实践出真知”是就理论内容的来源说的,决不是说不必经过理论思维的活动、仅靠参加实践就能形成对于客观规律的理论认识。实践提供的经验还不是科学的理论,只有经过理论思维加工以后,零碎片断的经验知识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思维的加工活动就属于理论研究工作。因此否认或贬低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理论也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推动实践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我们把哲学的革命作用理解为,只是为我们从事的每一个实践活动找出它合理性的根据,因而要求哲学必须提出有利于实践意志的论证,不能提出与它不同的见解,这也不利于哲学与实践的结合,更不利于发挥哲学的革命的作用。理论的基点是一般性,实践活动的基点是个别性,二者在这一点上是对立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推动作用正在于这种对立的统一关系;理论来自于实践而又能超越实践活动的限制、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的发展,也奠基于是这种对立的统一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决不是二者的直接符合。马克思明确地说过,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作用,正在于它能够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否认理论与实践的差别性,去掉辩证法中的否定性,哲学就不可能对现实具有指导作用,不可能推动实践活动发展,哲学自身也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理论研究在于探寻真理。可是,如果我们由此便要求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只能讲真理,不能说错话,一旦发现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就对说错话的人打棍子,这也不利于哲学理论的发展。错误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和认识对自身的反省认识)中都是难免的。一切创新的见解都要经过从不全面到全面、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错误不仅难以完全避免,而且还常常是正确认识的先导。所以如果禁止人们犯错误,许多真理认识就不可能出现了。此外,我们分辨正确和错误也要经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犯错误。所以,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哲学理论研究中的错误,也就不能促进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常存而又常新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一条件下被解决了,达到了统一,随之又会产生另一条件下的矛盾,又需要使二者重新统一。在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矛盾则总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企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但是,这也不等于这一矛盾不能解决、无须去解决、或者可

以不必去认真对待。理论虽然永远不能摆脱与实践的矛盾，却又必须不断地解决这一矛盾。这一矛盾的内容的不断更新——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正是哲学生命的基础，矛盾内容更新的过程，也就是哲学不断发展的过程。

长期以来影响我国理论发展的除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还有理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两个问题中，处理好理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更为重要。这些年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解决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理论与政治的不正常的关系。在理论界存在着的重史轻论、惧怕实际的倾向就是如此。人们所以要远离实践领域，转去搞历史、搞自然科学或者专门研究经典著作，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不懂得研究实践问题的重要性，也不是对实践问题不感兴趣，而主要是不愿去惹麻烦、自讨苦吃。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现实的榜样摆在眼前。现实的课题不仅是一个充满艰难的课题，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课题，人们不敢去碰它、不愿去碰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责备他们缺乏斗争精神、缺乏牺牲勇气。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理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适宜的温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迅速发展的优越环境，而要人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付出不应有的代价呢？

理论和政治的不正常关系是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极左思潮被批判，今天的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划清学术思想和政治的界线，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学术讨论，强调在学术领域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保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等等，这就为哲学的蓬勃发展、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在处理理论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上就不存在问题了。在我国极左思想的影响深远，并不是短期间所能根除的。在政治方面、理论的根本方面我们已经辨明了是非，然而各个局部领域，尤其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就不一定都分辨得那样清楚。人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会不自觉地表露出左的思想影响。但是，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在我国一定会出现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发展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系）

